

培文书系 | 社会科学译丛

大转型的 社会理论

[英] 威廉·乌斯怀特 (William Outhwaite) 拉里·雷 (Larry Ray) 著 吕鹏 等译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培文书系 | 社会科学译丛

大转型的 社会理论

[英] 威廉·乌斯怀特 (William Outhwaite) 拉里·雷 (Larry Ray) 著 吕鹏 等译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北京市版权局著作权合同登记 图字: 01-2010-5301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大转型的社会理论/(英) 乌斯怀特(Outhwaite, W.), (英) 雷(Ray, L.) 著; 吕鹏等译.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1.12

(培文书系·社会科学译丛)

ISBN 978-7-301-19766-0

I. ①大… II. ①乌… ②雷… ③吕… III. ①社会学—研究 IV. ①C91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1)第234208号

Social Theory and Postcommunism © 2005 by William Outhwaite and Larry Ray
All Rights Reserved. Authorised translation from the English language edition published by Blackwell Publishing Limited. Responsibility for the accuracy of the translation rests solely with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and is not the responsibility of Blackwell Publishing Limited. No part of this book may be reproduced in any form without the written permission of the original copyright holder, Blackwell Publishing Limited.
This translation published under license.

书 名: 大转型的社会理论

著作责任者: [英] 威廉·乌斯怀特 [英] 拉里·雷 著 吕鹏 等译

责任编辑: 徐文宁

标准书号: ISBN 978-7-301-19766-0/C·0716

出版发行: 北京大学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海淀区成府路205号 100871

网 址: <http://www.pup.cn> 电子信箱: pw@pup.pku.edu.cn

电 话: 邮购部 62752015 发行部 62750672 编辑部 62750112

出版部 62754962

印刷者: 三河市欣欣印刷有限公司

经 销 者: 新华书店

720毫米×1020毫米 16开本 18.25印张 350千字

2011年12月第1版 2011年12月第1次印刷

定 价: 40.00元

未经许可, 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之部分或全部内容。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举报电话: 010-62752024 电子信箱: fd@pup.pku.edu.cn

中文版序

这本书能在中国出版，我们感到非常高兴和荣幸。在该书原版的序言中，我们承认“我们没有涉及中国，尽管她在世界上的重要性正在变得日益突出，因为直到目前为止，伴随她的经济发展，并没有出现根本性的政治变迁。”在很多方面，中国这种与持续的政治控制相联系的经济自由化，为人们给苏东所预言的道路提供了一个例证，当然，苏东并没有这么做。解释苏东和中国迥异的改革结果，仍是比较研究领域中的一个关键问题。

有两种处理这一问题的方式。首先，对我们这样立足于欧罗巴大陆最西边一个岛国的人来说，最自然的想法就是去问：为什么 20 世纪 90 年代之后的中国没有更接近苏东？其次则是去问：为什么苏东没有走中国的发展道路？当然，在 20 世纪 90 年代，这已经是一个话题。像魏昂德 (Walder, 1997) 就曾对此做过实质性分析。他认为，在中国，政府鼓励官员们去发展(或是作为替代，去关闭)国有企业。尤其是：

(私有化)从财政变化和竞争增强的过程中自然而然地发展起来……这种渐进的改革过程改变了人们的心态，其结果便是，官员们自己产生了私有化的动力。要想理解这一变迁的过程，我们就需要将国家看做经济行动者的组合体，将他们行为的动力放在我们分析的核心。

(Walder, 1997, p.448)

这种情形在苏东可能发生吗？魏昂德指出，匈牙利确实进行过一些市场化改革，但因对国有经济产生了巨大影响，而被扼杀了 (Walder, 1997, pp.434—5)。我们还想补充一个因素：那里当时因为与苏联的支配相联系，共产主义基本上失去了信誉。这也或多或少可以用在对苏联本身的分析上，而对俄罗斯来说，1991 年底苏联发生的变化，使得任何一种走“中国道路”的前景都不存在。中国在进入 90 年代之后在某种意义上确实遵循了匈牙利的道路，但那是

20 世纪五六十年代的匈牙利：小心翼翼的经济和政治自由化。图克尔（Aviezer Tucker）异常敏锐地分析了 90 年代之后的俄罗斯和中国，指出：

俄罗斯和中国在社会上和政治上依然延续了后全能主义的模式。在这两个国家……后全能主义的精英们，试图将他们从革命精英那里继承来的权利，调整成自己的利益。在俄罗斯，这一过程是自发的……在中国，这一调整直接来自上层，因此是稳健的和富有连续性的。

（Tucker, 2010, p.177）

此外还有一个问题，这个问题出现在 90 年代以来转轨的东欧国家里：哪些类型的经济体制及在多大程度上，挑战了我们现有的关于经济发展的主流社会学理论。我们主张一种关于联合的和非均衡发展的理论模式，这一模式避开了任何一种社会变迁会导致单一组织性目的的观点。至于我们在其他地方提出的关于 90 年代之后资本主义和民主的分析（Ray, 2009; Outhwaite, 2010, 2011），在多大程度上与中国未来几年的发展相关，则是我们现在无法冒险去预言的事情。

（吕鹏 / 译）

参考文献

- Outhwaite, William (2010) 'Europe at 21: Transitions and Transformations since 1989', LEQS Discussion Paper Series No. 18, London: LSE, 2010.
- Outhwaite, William (2011) 'Postcommunist Capitalism and Democracy', International Social Theory Consortium Annual Conference, University of Sussex, June 2010. Forthcoming in *Journal of Democratic Socialism*.
- Ray, Larry (2009) 'At the End of the Postcommunist Transformation? Normalization or Imagining Utopia?', *European Journal of Social Theory* 12, 3, August, pp.321–36.
- Tucker, Aviezer (2010) 'Restoration and convergence: Russia and China since 1989', in George Lawson, Chris Armbruster and Michael Cox (eds), *The Global 1989. Continuity and Change in World Politics*.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pp.157–178.
- Walder, Andrew (1997) 'The State as an Ensemble of Economic Actors: Some Inferences from China's Trajectory of Change', in Nelson, Joan, Charles Tilly and Lee Walker (eds), *Transforming post-Communist Political Economies*. Washington: National Academy Press, pp.432–452.

绪 言

共产主义的发展史，代表 20 世纪最引人注目、最有世界历史性的力量，塑造了 21 世纪头十几年里所发生的事件的背景。当然，这一现象早已成为无数学术、政治、新闻杂志和文化评论的主题；在上个世纪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政治生活的基本参考点都是，世界被分割为在意识形态和军事上相互竞争的两个体系。如今，不仅是苏东体系，就连社会主义的理念都退出了世界舞台；然而，它们的退出更像是一声呜咽而不是爆炸。80 年代末到 90 年代初短短几年间，苏东体系就快速而平静地倒下了。但取而代之的是什么呢？正是在这里，世界发展的进程变得不再那么清晰，也正是在这里，苏东国家转轨后出现了好几种相互竞争的未来和现实。事实上，90 年代之后的国际形势，为世界历史打开了一个新的舞台，其外形至今仍在形塑中。本书借用一系列社会学进路和理论，分析了这些事件，并一直都在追问：这些历史性事件，可能会怎样影响社会学自身的理论化进程？我们知道，大多数社会学理论进程都发生在西方世界，而且直到今日，这一情况在很大程度上依然如故。

本书考虑的是：认真思考 90 年代之后涌现出的问题，如何能够重新审视和推进现有的争辩，进而为关于社会变迁和发展的社会理论化进程作出贡献。我们生活在一个没有（系统性）替代选择的世界中，在这个世界里，社会正义和不平等议题仍很重要，仍然迫切需要找到解决它们的办法；本书就这种生活的后果提出了各种问题。本书的论点，立基于经典社会理论，但也有所超越，正视了那些将我们与经典理论家的世界区别开的重要鸿沟。面对 20 世纪晚期以来快速而深刻的社会变迁，质疑我们的理论框架是否依然适用于这些新奇的文化、经济和社会格局，非常重要。社会学家们还需要进一步追问：最近出现的那些理论预设，像“文化转向”、后现代性、去建构主义、全球化和认同，是否

恰切地把握住了新千年里的社会进展。社会学依然不愿忘记它的经典之父们，而这一传统的意义，既是有力的，也是有问题的。说它是有力的，是因为那些经典提供了丰富的洞见、概念和分析资源，可被拿来重新解释，来理解当下问题。说它是有问题的，则是因为那些经典的社会世界，很大程度上是一战前那些工业的、帝国的、高度资产阶级的欧洲社会。在今天这样一个后殖民、后工业的全球化社会世界里，我们如何用在那些社会环境中形成的概念来面对现在的问题呢？为了回答这些问题，我们写了这本书，希望本书既能对学生有用，又能为这一学科更广泛的思考作出贡献。

致 谢

我们要感谢许多朋友和同事，他们为本书的成形作出了各种方式的贡献。乌斯怀特尤其想要感谢在苏塞克斯召开的一次社会和政治思想工作坊上，Justin Rosenberg 和其他与会者对与本项目有关的一篇论文所做的评论，以及由 Gerard Delanty 组织的在德国上巴伐利亚州 Schloss Elmau 酒店召开的一次会议上与会者的评论。苏塞克斯欧洲学院的同事们组织的工作坊（及与会者）也提供了非常有价值的背景。雷想感谢 Georgi Dimitrov（索菲亚大学）、Benjamin Forest（美国达特茅斯学院）、Slawomir Kapralski（华沙社会研究中心）、Barbara Misztal（莱切斯特大学）及 Richard Sakwa（肯特大学），感谢他们对在那里讨论的议题所提供的帮助、有益评论和讨论。

我们还要感谢培生教育集团（Pearson Education）允许我们再次使用表 3.1。

威廉·乌斯怀特
拉里·雷

目 录

中文版序·····	3
绪 言·····	5
导 言 80 年代末 90 年代初的剧变 ·····	1
第一章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转型期的理论 ·····	7
第二章 阶级：马克思与韦伯 ·····	27
第三章 社会、团结和失范：涂尔干 ·····	47
第四章 趋同的三种类型·····	77
第五章 社会主义、现代性及超越 ·····	102
第六章 全球化和趋同·····	131
第七章 东西方市民社会·····	165
第八章 现代性、记忆与转型社会 ·····	196
第九章 结 语·····	224
参考文献·····	232
索 引·····	261
译后记·····	282

导言 80 年代末 90 年代初的剧变

<1>

20 世纪大部分时间里，世界上约有一半人生活在“共产主义”这一官方意识形态中。直到 20 世纪 80 年代晚期苏东体制解体、冷战结束，这个世界一直被划分为“资本主义”和“共产主义”两大敌对阵营。本书的主要关注点，就是主张，这些事件对社会理论的建构产生了重要影响，而它们中的许多后果，直到今天都还没有得到广泛承认。我们评介了一系列核心理论议题，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20 世纪 90 年代之前与之后的经历，如何改变了我们关于社会理论的思考？概括来说，这些议题包括社会阶级、社会团结、社会变迁和融和、现代性、全球化、市民社会和国家、记忆和认同。在每个案例中，我们都会先陈述争议的现状，从中确认出一些关键议题，然后试着揭示这一转型会给这些议题带来什么样的新观念。广义上讲，我们关心的是，90 年代之后的环境给社会学分析提出了什么新的挑战。冷战的世界，是一个充满边界的世界：既有以柏林墙为象征的实物边界，也有“我们”和“他们”之间的符号边界。90 年代之后，边界已经变得更加容易渗透，但由移民和“政治难民”带来的恐慌仍然存在。苏东转轨引发了国际移民现象，同时也给世界带来了安全和认同方面的担心。

大多数主流社会理论都扎根于“西方世界”，即西欧、北美和澳洲各国组成的“发达资本主义世界”的经济、政治和文化体验。世界上的其他地方，似乎只是被限定在“发展社会学”、“世界体系理论”、“东欧 / 共产主义社会学”这几个特定的狭小领域内。前者在很长时间内一直占据着社会学的核心议题，现在则在很大程度上被全球化理论所取代。不过，主流社会学一般都是通过工业社会

<2>

和趋同性理论来研究共产主义。这一有限的焦点其实相当奇特(odd)，它关注的是“东西方的分裂”对当代社会，以及实际上对这个世界本身所具有的重

要意义。许多情况下,美苏之间的核平衡(nuclear standoff),确实给世界上大部分地区构成威胁,而在20世纪后半叶发生的许多地区冲突中,我们也都可以明显地发现超级大国的干涉。也许有人会认为,社会理论家之所以对这些议题感兴趣,正是因为它们本身固有的重要性,但是,其实还有别的原因,使得苏东的经历对于我们评估社会理论显得尤其重要。

这些原因如下:第一,社会重建的规划,与社会学的核心内容相关联,并有很多相同之处,它符合推论得来的社会进化的“法则”,而这也正是共产党宣称他们准备去做的事情。社会学早期的抱负,就是在理论和政治多样性中找到实证主义和马克思主义试图确认为社会发展“法则”的东西。^[1]相信历史将会沿着一条事先明确确定的道路前进的观点,是一种错觉,但是,正如我们在后面将会看到的那样,这种错觉仍然十分顽固地存在。

第二,资本主义的起源和命运,是社会理论的一个核心关照。现在,有一个机会,可以让我们观察资本主义在新的环境中是如何建构起来的,这对我们理解这门学科中的核心概念也有非常重要的意义。社会科学经常抱怨,在如此平庸的环境中,根本无法去做什么实验。而苏东体系本身就是一场实验,它的解体,以及90年代之后发展的过程,对社会科学来说,绝对是最有价值的资源,它绝对不应该被限制在地区研究(area studies)的一潭死水中,或是仅被看做一门“转轨学”(transitology)。

第三,90年代之后,欧洲的遗产也是一个问题。它可以促使我们检讨全球化和资本主义整合(包括欧盟扩大)的局限,以及当前与政治难民及冷战后移民有关的各种议题。第四,尽管方式并不相同,但是社会学往往雄心勃勃地宣称要批判现行社会状况。不过,批判依赖于是否存在一种有潜力或可以想象的选择,可以替代现存社会形式。因此,共产主义的演变,有两种不同的可能意义。一是针对资本主义,现在并不存在一种“真实存在”的替代选择,而且,很有可能以后也不会出现。二是,共产主义至少是暂时走下了历史舞台,这就为想象一种非威权主义的(non-authoritarian)和真实的替代选择提供了可能;我们不

[1] 孔德与马克思的联系,并不像他们各自与圣西门的关系那样明显。马克思甚至在研读黑格尔前就已开始研究圣西门,并以学生身份参加了路德维希·高尔(Ludwig Gall, 1791—1863)的演讲,后者是圣西门主义最主要的代表人物(Bottomore & Rubel, 1970, p.25)。

得不承认，至少就目前情况来看，苏东的命运沉重地打击了任何系统性替代资本主义的想法。在这一意义上，我们也许不得不等待社会主义重新恢复其声望的那一天，就像韦伯在俄国革命爆发后所预言的那样。^[2]

那么，对社会学理论来说，80年代末发生的事情究竟具有什么样的意义呢？我们选择从古典社会理论的关怀出发来讨论这些议题。这并不是因为我们认为自古典理论家之后，社会理论中什么都没有发生，而是因为他们确立的一系列基本的研究底线，或者说范式，至今仍然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下面的章节中所讨论的市场和阶级关系的议题，仍然不可否认地受到了马克思和韦伯的影响。在第三章中，我们沿着涂尔干设定的议题，分析了社会团结，以及“社会”和社会决定因素，虽然我们的主张与涂尔干的基本主张有很大不同。第四章则讨论了一批稍晚一点的理论：工业社会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逐渐趋同的各种模式。我们认为，虽然到了80年代最后一年的秋天，资本主义和国家社会主义将会逐渐趋同的观点已被判处死刑，但是，随着中国开始走向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大路，下面这一观点中仍有大量有价值的东西，那就是：自发发展或者在外部激励下的发展，将会在政治、经济 and 更广泛的社会组织上趋向相似的模式。

接下来的章节，主要关注的是一些更加晚近的理论，如现代性（某种程度上也包括后现代性）和全球化（第五、六章）。其实这些理论本身，也从马克思及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经典作家所设立的议题那里，吸收了大量养分。关于市民社会的理论（第七章），则重新唤起我们对托克维尔的民主理论，以及在1980年代“持不同政见运动”中再度流行起来的概念的重视。

本书始于“80年代末90年代初的剧变”，止于对这一事件及其他转轨的评论。之所以说这一剧变让人震惊，我们首先指的是，进入90年代之后欧洲相对和平的环境。当然，南斯拉夫是一个带有悲剧色彩的例外，俄罗斯则是一个局部带有悲剧色彩的例外，除此之外，再没有别的更加血腥的权力集团情况。第二，我们认为，剧变的结果，支持了斯考切波（Theda Skocpol）关于革命模式的

[2] “1919年初，韦伯给他年轻的同事和朋友卢卡奇（Georg Lukács）写了封信。当时卢卡奇已成为一名共产党员，并将共产主义看做德国理论文化中最伟大的诺言。在那封信中，韦伯警告卢卡奇，鲁莽的俄国实验将会在一百年内夺走社会主义的声望和权威。让我们以这本书中最乐观的句子结尾吧：对这一百年而言，我们已经过去了六十年。”（Fehér et al.1983, p.299）

理论。这一理论突出强调了，难以琢磨的意识形态和合法化资源，而不是军事武器，对于政权瓦解的重要性。

另一个让人震惊的地方是，仅仅在 80 年代末 90 年代初的头几个月，苏东就发生了明显变化，轻而易举地转向了传统“西欧”社会的模式。在很多案例中，东方发生的变化比西方还要快：市民社会运动的兴起和衰落、重组“老”工业资源、大幅削减社会福利供应。对于这种快速适应，即将整个前权力集团转换成完全“标准的”政治和其他社会形式，部分解释是，当时人们普遍感觉，转轨的整个目的就是要“回到欧洲”和“恢复常态”（normality）。东欧的市民们一直在经历一场社会和政治实验。欧盟扩充计划的逐步实现（德国是个例外），只不过是强化了一种已经存在的趋势。

不过，所有这些，引发了更加广泛的问题，它们与可预测性没有太大关系，而更关心社会过程的决定性因素。不管是糟是好，我们的未来是如何一下子转眼间就变成同一种模式？表面上的自由是否只是一种幻觉，或是根本无法加以利用？我们之所以采纳这些模式，究竟是因为它们已经证明了自己在进化的意义上，或者至少在实践上是最为理想的，还是说仅仅是因为它们来自西方熟悉的事务，便于模仿？像卢曼和吉登斯这样的理论家已强调指出，人类往往通过“例行化”（routine）方式，处理复杂事务；而关于路径依赖的中层理论，从埃尔斯特（Elster, 1978）关于历史的“反事实条件”（counterfactual conditionals）和“分支点”（branching points）的早期著作中吸收营养，也已在勾勒具体的社会发展方面取得了值得赞扬的成就。

一系列相关问题，关注的是在社会形构（social formation）分析中，附属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各种因素的分量。如果有必要，一个人可以很简单地将 80 年代末 90 年代初发生的事情，看做反对马克思主义经济优先论的一个进一步的证据。这并不是要去否认，国家社会主义经济在 20 世纪 80 年代的衰退和普遍虚弱，是它们丧失合法性并最终解体的关键因素。

人们可以举出有力的例证，来支持政治才是首要因素的观点，因为许多运动的发生，更多是为了追求自由和民主，而不是出于经济考虑。80 年代最后一年发生的事情，其实是一种很特别的政治解体，苏联的保护突然之间被撤回了。如果戈尔巴乔夫在 80 年代晚期失去权力，或者推行倒退的政策，“80 年代最后一年”很可能会推迟很多年才会到来。相反，如果苏联早在 20 世纪 70 年代就

实行戈尔巴乔夫式的政策,“80年代最后一年”也许会提前十年就发生。此外,这些政权在文化上受到的侵蚀,也应获得比以前更多的重视。各种文化形式,从诗歌到摇滚乐,越来越不服从集中化管理,通俗文化更是使得这些政权看上去喜欢上了那些来自过去的东西。

在20世纪90年代的学者们看来,经济和政治决定论模式的胜利,是以破坏更加强调社会和文化取向的研究为代价。达伦多夫就曾区分出“宪政律师的时间”(the hour of the constitutional lawyers)、它的直接继承者或随从“政客的时间”(the hour of the politicians),以及更晚点的“市民的时间”(the hour of the citizen) (Dahrendorf, 1990, p.85, pp.92—93)。达伦多夫关于六十年完成市民社会建设的预言,当然是一种过高的估计,不过,他的一般性分析现在看来还是有预见性的。宽泛的说,90年代后的欧洲所发生的事情,就是快速修复政治和经济困境;与之相伴随的是社会左派的自给自足,很大程度上,它并未仅被视为政府“社会”政策的对象。90年代的后五年,加入欧盟的谈判进一步强化了遵守政府法规的重要性。那些对正式民主和实质民主区别对待的分析,像卡尔多和万卓达的研究(Kaldor & Vejvoda, 1999[2002]),则成了一种异议。 <5>

我们当然可以借用瑞士籍加拿大学者弗雷泰格一本著作的标题(Freitag, 2002),“对社会的遗忘”(forgetting of society),来类比“社会”这一概念在社会理论中被降到了次要地位。不过,90年代后的经历,还是证明了社会、市民社会、社会结构这样的观念的重要性,尽管这些观念也常常被各种各样的偶发事件所困扰。资源(如石油)和市场的变化,很快就能改变整个经济体制;政治系统也可以在它们的正式体制内被改变;但是社会,它的塑造仍在很大程度上被限制在地方性的民族国家的边界内,从而保持了固有的特性,有一种“黏性”,那些试图在短期内将其彻底改变的企图只能落空。

共产主义的宣传者,将这种想法转变成一种政治哲学。虽然我们几乎并不赞同这种实体论(substantialist)进路,但我们却同意他们的一个判断:“心灵的习性”(托克维尔语),虽然模糊但却根深蒂固,在任何一种对当代社会的充分描述中,它都是一个重要因素,其重要性绝对不亚于那些过去的岁月。这种关于现代性的观点,也许更加“轻柔”(lighter),或者用鲍曼的话来说,更加非正式和具有流动性,但它仍是社会现代性根本形式的一种变体(第八章)。最终,这些议题将我们引向2004年的欧盟“东扩”。在德国及大部分前苏东国家,转

轨中的平淡无奇或“正常状态”，以及现在因为东扩过程而强化的“第二次转轨”，掩盖了这些国家中更加基础性的变化，而欧洲的社会科学家们对此还没有引起足够重视。

概略描述过本书相当富有野心的议程后，我们现在应该说一说那些我们不打算去涉及的东西。我们尽力回避那些几乎将其所有重点都放到对 90 年代后发展状况进行论述的著作，包括某些关于波兰、匈牙利、斯洛伐克 / 捷克共和国这“三驾马车”的优秀研究；我们主要关注的还是欧洲，包括俄罗斯；而在欧洲内部，我们主要关注的是那些处于转轨前沿的国家。我们没有涉及中国，尽管她在世界舞台上的重要性正在变得日益突出，因为直到目前为止，伴随她的经济发展，并没有发生根本性的政治变迁。此外，亚洲其他地方（即东南亚和前苏联的西南部）的共产党社会中所发生的政治和经济变迁，因为具体情况尚不明朗，所以还未能产生明确的理论意义。

其次，虽然我们承认两极社会终结，出现了新的分裂和冲突，但这并非本书的重点。我们抵制住了诱惑，既没有去选择福山关于促进和解的观点，也没有去支持亨廷顿有点夸大其词的启示录模式（apocalyptic model），并谢绝了针对我们关于未来世界地缘政治的观点而提出的挑战。尤其是，对于当前对待世界恐怖主义的那些夸张反应，我们也持怀疑态度。正如伯格森饶有兴味地指出的那样（Bergesen, 2003），世界恐怖主义从 20 世纪 70 年代发展至今，在很多方面都是 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恐怖主义浪潮的重复，后者直到一战和俄国革命爆发，才宣告中止。这些都是非常重要的议题，但是，我们并不会对它们进行充分讨论，因为讨论它们既超出了我们的专长，也超出了这样一本以严格的理论为议题的著作所能承受的限制。

（吕鹏 / 译）

第一章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转型期的理论

<7>

既然转轨意味着从根本上推翻一个业已确立的社会体制，我们打算回到基本原则上去追问：对于理解这些社会来说，哪些社会理论资源可能是最有意义的？马克思主义是一个可能的出发点。一本幽默的苏联指南，就冠以“从马克思的原初思想出发”这样的标题 (Polonsky & Taylor, 1986)，大多数关于苏联及其盟国的研究，也都从马克思主义理论，以及布尔什维克的领导人及其继承者的目标开始。当然，还没有一本只是从马克思主义出发，对俄国革命或苏维埃政权进行评估的著作；人们使用的理论五花八门，从官方关于科学共产主义的教条，一直到各种各样的无政府主义、毛主义和托洛茨基主义的主张，而直到 1980 年代，在苏联和东欧的大学里，前者都还是核心课程的组成部分。当孟什维克者主张，就发动共产主义革命而言，俄国的情况尚不成熟时，在许多方面，他们比布尔什维克者更接近马克思主义；俄国革命应该要么被视为对列宁打破传统马克思主义的一场辩护，要么就是一场“反对马克思主义的革命”，因为它挑战了马克思主义所强调的决定性因素。

与此相似，那些认为苏东转轨说明了马克思主义在理论和实践上陷入双重失败的主张，也只是所有可能性结论中的一种。甘地在被问到如何看待西方文明时答道：那听起来像是个好主意；对于共产主义，他可能也会作出同样的回答，因为它从未在完全合适的情况下被尝试过。即使马克思主义对资本主义的预测是错误的，而且对它的治疗比疾病本身更糟糕，马克思主义对资本主义的诊断仍是有根据的。另一方面，即使马克思主义能够提供关于资本主义的好理论，但在解释共产主义革命或接管的起源、共产主义体制的运转、衰落及转轨的过程等问题上，它显得并没有太大信心。经济简化论也无助于解释：

为什么在共产主义的早期和晚期政治军事过程似乎更加必不可少，以及在该体系内，权威性资源 (authoritative resources) 看上去比配置性资源 (allocative resources) ^[1] 更加重要 (Giddens, 1985)。

如果说马克思主义并不擅长处理这些过程的话，那么，必须承认，在低层次的生产力发展这一问题上，它却能提供一套淳朴但决不荒谬的说明。如果说它不曾解释俄国共产主义革命的起源、它在东欧和别的地区的军事和地理扩张的话，那么，在苏东转轨，以及这些国家在 90 年代多少有点凄凉的景象等问题上，它却能提供合情合理的解释。关于这些国家 90 年代发展情况的说明，往往倾向于降低它们与别的资本主义类型在制度或政治上的差异的重要性，转而强调这些国家或政权处在现代全球资本主义的边缘或不利位置。从这方面来说，马克思主义可以将它的政治劣势转变为理论优势，因为它最擅长的领域就是分析资本主义。

但是，针对那些质疑，如果我们准备给予马克思主义如此多的辩护的话，那么，对社会理论的其他传统，我们至少也应同样给予充分的关注。最明显的轴线是马克思主义及其批判者（像批评马克思主义的决定论和经济简化论的韦伯）之间，但是我们还应记住，霍布斯和托克维尔之间有一个相当不同的轴线。当然，毫不奇怪，对于霍布斯这样一个将 17 世纪的革命性骚动写进著作中的思想家来说，他肯定会关注强有力的、至高无上的权力的建立；而许多 90 年代以来的思想家，尤其是在俄罗斯，则因他们所导致的经济和政治大混乱，而受到霍布斯主义者所提出的替代性方案的吸引。就连那些厌倦（再一次）专政的人（他们占大多数），也不得不承认，这些国家的这些特征，是它们的病理缺陷（参见 Staniszkis, 1999, 第 4 章）。80 年代最后一年之前的社会理论倾向于强调，苏联及其卫星国的未来，将会是一种“拉美模式”。虽然最初的预测，即统治政党及其政权将会逐渐“墨西哥化” (Mexicanization) ^[2]，到了 80 年代最后一年突

[1] 权威性资源指权利生成过程中所需要的非物质性资源，是某些行动者相对于其他行动者的支配地位的结果；配置性资源指权利生成过程中所需要的物质资源，包括自然环境和人物质产品。——译注

[2] 从 1910 年在革命中诞生以来，在整个 20 世纪中，墨西哥的“制度革命党” (PRI) 一直掌握着权力，默许但并不鼓励替代性政党的存在。[其实，随着 2000 年福克斯赢得大选，墨西哥的政党轮替已经开始。——译注]

然失效，但是，其中一些基本分析仍然十分有用。

这一进路的另一端，则是强调在全能的斯大林主义和新斯大林主义国家的废墟上，进行民主化建设及发展调解性制度（intermediate institutions）的需要，重新培育曾被国家极力破坏和瓦解的市民社会。在这里，托克维尔关于美国民主中市民社会模式的理论，具有重要意义（Wellmer, 1993）。说得更广些，有一大堆理论，受到20世纪最后二十年里全球民主化转移这一短期丰富证据的鼓舞，将其关注点放到了追踪和评估跨文化情景中的民主化进程上（参见 Wolton, 1993; Pridham et al., 1994; Held, 1995; Fischer, 1996; Nagle and Mahr, 1999。还可参见 Lefort 写于1981年早期的预测性著作）。最后，正如我们在第四章和第七章中将会详细论述的那样，欧盟将民主化作为其成员资格的前提条件，对中东欧国家产生了重要影响：既是一种起限制作用的因素，又促进了市民社会在个别转轨国家中的扩大和民主化。 <9>

第三个轴线可能是在斯宾塞和涂尔干之间，或者，用它们更加现代的形式来说，是在新自由主义经济及政治理论家哈耶克和共产主义的宣传者之间。由于它们的统治特征，共产党社会必须在官方层面用马克思主义术语来解释自己，但在实践中，它们关于自己的官方想象（official self-image），其实更加接近涂尔干：一个和谐地整合起来的国家共同体，受到共享的信念和价值的推动，劳动分工中再也没有对抗、异化或强制的特征。正像美国社会学家古尔德纳（Gouldner, 1971）正确地指出的那样，美国的功能主义，与苏联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和科学共产主义之间，其实有很多相似之处，前者大量采纳了涂尔干的模型，却在总体上避免使用“团结”这一左派术语。人们当然可以争辩，在国家社会主义的社会中，团结在实践中到底意味着什么，但是，与此相似的估计应该是，官方关于团结的修辞，不仅与人们在面对普遍的物质短缺时所培养出的自助网络（self-help networks）相一致，还与人与人之间高度的相互冷漠（mutual indifference）相一致，后者鼓励人们产生一种感觉，那就是任何体制性的缺陷，都是国家的责任。^[3]

这种冷漠在转轨之后延续了下来，而曾出现过的非正式的相互援助却瓦解

[3] 不过，甚至在前民主德国，人们也表现出很高的爱国热情，例如他们对体育竞赛获胜和航天竞赛中取得的成就的反应。